鸦片战争前四十年间驻藏大臣情况及拒援廓尔喀事件

张　晓　虎

起嘉庆元年迄道光二十年，这四十余年间清中央政府治藏政策的情况、特点及得失，在以往的研究中是个较薄弱的环节。究其原委，一则是嘉庆、道光两朝政府目光短浅、治藏乏术；其次，此时的清王朝为内忧外患、捉襟见肘的困窘局势所累，根本无暇以更多的精力顾及地处极边的西藏。然而，在清王朝秉政的二百六十余年间，尽管呈时强时弱之势，治藏政策毕竟绵亘不断。因此，在研究这一政策的连续性时，不能因嘉道两朝薄而置于不顾。本文拟就此期间驻藏大臣的情况，对嘉道二帝的治藏思想及政策做一探讨。

一、关于驻藏大臣的遴选

清政府对西藏派驻官员直接参预政事，可推溯至康熙年间，和硕特拉藏汗与第巴桑结嘉错新立六世达赖之争时。当时，西藏地方出现了人心浮动的不安局面，康熙帝派侍郎赫寿到达西藏，协同拉藏汗“办理事务”。雍正五年（1727年）正式设置驻藏办事大臣的机构后，这一重大措施便做为清政府治藏政策的重要内容一直延续下来，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清前期治藏政策及措施是比较成功的，那么除这些政策和措施本身的正确因素外，更得力者应是大批恪尽职守的任事官员。然考诸鸦片战争前四十年间的驻藏大臣情况，不惟贪贿营私风行，更甚者亵渎职事，致使诸务弊坏、言路堵塞，清廷得到的往往是错误或虚假的下情。如是，嘉、道时期的治藏情况可想而知。

嘉庆即位之初，刚逊位的太上皇乾隆帝便在给班禅额尔德尼呼毕勒罕的敕谕中，直言不讳地谈到自己派进驻藏大臣的本意。他说：“前因藏内事务，噶布伦等措置乖方，致廓尔喀（尼泊尔）陆梁滋衅。朕特命大将军福康安率师平定。廓尔喀等倾心向化，复命尚书和琳革除积习，酌定章程，一切井然有序。又命松筠等驻彼，循守成规，办理诸事，务期利济众生，俾藏地永臻宁谧。”①同时，又敕谕达赖喇嘛曰：“至朕于本年传位嗣皇帝，改元嘉庆元年。惟训嗣皇帝听政精勤，覃承家法。”云云。那么，刚嗣位的嘉庆皇帝从其父皇处，究竟在治藏问题上“覃承”了什么样的“家法”呢？

松筠是乾隆在位时派出的最后一位驻藏大臣，但在乾隆刚去世的嘉庆四年正月，便接到“命户部尚书驻藏大臣松筠来京供职，以兵部侍郎英善为驻藏大臣”③的旨谕。表面上看，这不过是一次驻藏大臣的正常迁调，而细考松筠和英善二人的情况，却不难发现在驻藏官员的遴选问题上，嘉庆与其父皇乾隆对治藏的指导思想已发生了十分微妙、却又是判然两途的根本转捩。

松筠系玛拉特氏，蒙古正兰旗人。乾隆三十七年(1772)由翻译生员考补理藩院笔帖式，以后从军机章京历官至礼、工、户、兵部尚书等要职，他“历官三朝、恪恭匪懈”，也是清朝封疆大吏中卓有治绩的人物。松筠于乾隆五十九年七月陛工部尚书，授镶白旗汉军都统，寻

充驻藏办事大臣，至嘉庆四年正月召还京，调户部尚书，在藏供职四年余。

松筠驻藏之初，正值廓尔喀人侵被驱逐出境，著名的《钦定西藏章程》二十九条颁行不久。应该说，松筠与前任驻藏大臣和琳都是参与制定《钦定西藏章程》、对西藏行政体制实行重大改革的践履者，而章程条款的实现也正是这二人在任期间基本完成的。乾隆帝对西藏政体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不仅荟萃了前期治藏经验，而且奠定了有清一代对藏政策施行的坚实基础，其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将和琳与松筠这样的干员派驻西藏，也正反映了乾隆皇帝的励精图治的治藏指导思想。

遗憾的是，嘉庆帝并未承祧其父皇治藏的胆识和谋略，在乾隆刚死，他即任命英善接替松筠为驻藏大臣一事上看得很清楚。

英善，萨哈尔察氏，满洲镶黄旗人。他由亲军补侍卫处笔帖式，累迁刑部郎中、御史、布政使、总督等职。英善于嘉庆四年正月接任驻藏大臣，翌年正月即因清廷"追论始事（指镇压川楚白莲教农民起义事）诸臣玩寇罪"⑤而遭训斥。他在藏供职四年余，有三年属"戴罪立功"，几乎毫无政绩可言，反而在卸任后的嘉庆十一年（1806）时"以驻藏时于福宁私挪库款，徇私未举，降太常寺卿"。⑥这可以做为英善驻藏期间工作的评语。

松筠与英善二人的选任或升沉黜陟，决不仅仅是两朝帝王在识别、遴选驻藏官员问题上的知人善任或误失谬判，而是清楚地折射出乾隆和嘉庆在治藏指导思想上的不同。综考嘉庆一朝的历任驻藏大臣（帮办大臣不计）情况，更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嘉庆在位的二十五年间，共派出驻藏大臣十二名。其中，仅因失职或犯事而受到革职、迁调、降级、罚俸等重惩者，竟然多达五人，至于帮办大臣和下属官吏营私舞弊者更多。嘉庆十一年英善获咎时，嘉庆皇帝就曾说过："英善前在军营获戾，降为四品顶戴，派令赴藏，原系弃瑕录用之员。嗣因其驻藏数年，洊加恩擢，用至左都御史兼管旗务。乃伊自到京后，不过旅进旅退，无一建白，竟系年老苍猾。现在查出伊从前在藏之时，于福宁（嘉庆时派出的第四任驻藏大臣）擅借库项一事知而不奏，实属有心徇隐，著交部严加议处"。⑦十分清楚，嘉庆即位后派出的首任驻藏大臣，竟是一位"获戾"降级的"弃瑕录用之员"，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英善为官如何，而是嘉庆皇帝既知其实非堪膺重寄的官员，却偏偏指派这样一个人在《钦定西藏章程》亟待落实的重要时刻进驻西藏？

结论只有一个，即嘉庆帝在即位十六年时派瑚图礼赴任时说的话，旨曰："西藏为极边要地，二大喇嘛住锡之所。汝才非肆应，切勿任意更张，惟谨守成宪……"云云。旨意再明白不过，嘉庆皇帝对藏事缺乏乃父祖的透彻了解，心中无数，除"惟谨守成宪"之外，再无它术可凭依。因此，他惧怕任何一位驻藏大臣"任意更张"，以至惹来麻烦，以为循规蹈矩便可保西藏"永臻宁谧"。显然，嘉庆帝所谓的"切勿任意更张"，并非指驻藏官员在《章程》之外另搞一套，而是不允许任何驻藏官员有一点创建性的举止或言论。在嘉庆帝这一极端保守的治藏指导思想之下，历任驻藏大臣的吏治平庸、乃至舞弊亵职等事的接连出现，自然是顺理成章、毫不足怪的事情了。

再考诸道光朝的驻藏大臣情况，更是江河日下、远非康乾时可比。

如果将嘉庆时派出的最后一位驻藏大臣文干（他在任时跨两朝，入藏前曾是被革职的河南巡抚）计入，道光一朝至鸦片战争前共派出九名驻藏大臣，亦多属平庸贪利之辈。仅道光二十四年（1844）八月的一道圣谕内，历任驻藏大臣中因出借军火营私而受到"均著交部议处，严参具奏"者，居然多达六人。他们分别是文蔚、庆禄、关圣保、鄂顺安、孟保和海

朴。琦善在劾奏中说："总缘历任驻藏大臣不肯实心任事，以致诸务如此弊坏，天良何在？"仅此一斑，已足见道光朝吏治腐弊、朝纲废弛的情况。

从嘉庆、道光两朝委派驻藏大臣的情况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清政府治藏政策的制定以及实施情况，已从清前期的颠峰状态中逐渐走向下坡。任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莫不依靠各级官员去实现，而驻藏大臣这一制度虽名义尚存，但由于嘉庆以后派出者的个人素质和能力远不及前期，所以驻藏大臣做为施政机关的功用确实大大受到了削弱。而造成这情况的直接责任，则是嘉、道二朝皇帝与政府不可推诿的。

二、关于拒援廓尔喀抗英事件

如前所述，由于嘉、道二朝政府的懦弱和短视，使先祖开创的一代治藏功业逐渐败落下来。而在和拒援廓尔喀抗英一事上，清政府以及参预其事的驻藏大臣的妄自尊大、闭关自固和荒唐迂腐则更是暴露无遗。

英帝国主义觊觎我国西藏之心由来已久。早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和四十四年(1779)时，东印度公司的波格尔和忒湟便秉承英帝国主义的旨意，先后两次组成探察队企图入藏刺探机密。尽管遭到清政府及西藏地方当局的坚决驳斥而未能达成通商协定，但他们却通过多种途径刺取了大量有关西藏的情报，为其侵藏布署提供了依据。对英帝国的暗中动作，乾隆帝亦未深察且缺乏应有的警惕。当廓尔喀第二次侵藏时，清廷甚至"檄谕披楞（英国当时译名）协剿，因道路久无信息"。⑩战事平息后，英帝国回书寄到，乾隆帝以其措辞极为"恭顺"更未深究其中原委。可笑的是，当时的驻藏大臣在谈到有关英国的情况时，俱称其为"该部落"，这种对外事惊人的无知和危险的可笑程度，实在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如果说乾隆时的英帝国侵藏计划尚处在策划阶段，清廷对此缺乏洞悉或警惕尚可谅解的话，那么到嘉庆七年（1802）时，英帝国武装侵尼已成事实，而清廷上下对此仍旧如坠五里雾中。

嘉庆七年十月，驻藏大臣英善以极为含混的措辞奏报朝廷，有云："风闻披楞之兵，已将廓尔喀部落侵占六处。恐该国王势穷，仰仗天朝威力，或投奔唐古忒境内"⑪等语。这里，做为驻藏大臣的英善对于毗邻之邦已经发生的重大亡国之变，其全部的情报来源仅是"风闻"而已。更为严重的是，对英帝国已露端倪的侵藏野心，嘉庆帝竟然毫无知觉，谕示英善等人道："此等蛮触相争，竟可不必过问"。⑫翌年八月，清廷再次接到英善关于"廓尔喀头人与披楞互相和睦，该部落平安宁静"⑬的错谬已极的情报后，居然下令西藏官员将"所有边关附近地方暗备木、石等件，应即全数撤去，免致四处传播，疑有他故。并不必多差弁役，纷纷探听信息也"。⑭至此，乾隆时松筠等人调集外省银两构筑的边防设施被裁撤殆尽，中方边界几成空谷。这种大战临头却自行解除武装的荒谬做法，不仅暴露出清廷对西南边陲及西方国际局势毫无所知外，更严重的是在实际上鼓励和纵恿了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野心。

嘉庆十九年（1814），英帝国悍然挑起战端，出兵进犯尼泊尔，揭开了企图掠夺西藏毗邻的几个小国、然后进据西藏的战幕。尼泊尔派出使节进藏，急请清朝发兵助战，并一针见血地告戒清廷："披楞欲将唐古忒霸占，再往内地闹事"。⑮英国的战争企图已是路人皆知，而嘉庆帝却在同年九月接到驻藏大臣瑚图礼奏驳廓尔喀王求援的来禀时说："披楞在廓尔喀

西南，与唐古忒不通闻问，素无仇隙，岂有越境远来与唐古忒构衅之理"？⑯他甚至认为廓尔喀王的求援，是"自系廓尔喀与披楞连年争斗，求助天朝屡干驳饬，是以妄言耸听，希图赏赐金银，遂其私愿，所言实不可信"。⑰很显然，嘉庆皇帝认为西藏与英国"不通闻问，素无仇隙"，英国便断无"越境远来构衅之理"。他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扩张领土以及寻求世界市场的侵略战争，仅仅理解为某种恩怨之争，因此根本无视已经构成西藏门户巨大威胁的战争烟云，以廓尔喀王"妄言耸听，希图赏赐金银，遂其私愿"的寥寥几语，将尼方的来禀轻易驳回。其妄自尊大与昏庸无知的举动，并非皇帝本人的个人素质问题，而是深刻地表明了当时闭关自守的中国与世界局势之间的差距，中国已远远落后于世界潮流之后。

从嘉庆十九年至二十一年的短短两年间，廓尔喀王屡次告急求援，清政府却一味地"严行驳斥"。当廓尔喀战事日趋紧张、奏报频频传到北京时，清政府才隐隐感到了唇亡齿寒的危机，遂于二十一年四月派赛冲阿率兵赴藏守边。其目的不过是希图拒战事于国门之外。而赛冲阿错误地领会了嘉庆皇帝的旨意，进藏后即"带兵前赴边境，胁以兵威"，⑱并且分驰二檄"诘责廓尔喀、披楞"。赛冲阿这一举动却使清廷大为震恐，嘉庆帝急谕军机大臣，驰谕怒斥赛冲阿"实属妄诞，纰缪之至"。⑲赛冲阿的举动擅出己意，并未事先奏报朝廷。且不论赛冲阿称兵边境的举动正确与否，仅就嘉庆皇帝对此事前后的态度，可以看出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赛冲阿率重兵扬威于边境并分檄诘责尼、英两国构兵的"糊涂无理"举动，虽有自做主张的一面，但其檄文中"让路阻贡"、即两国因交兵打仗而阻碍了廓尔喀向清王朝例贡的派兵理由，系出于清廷事先授意。赛冲阿的错误不过是将这一旨意公开化了。实际上，不惟赛冲阿"糊涂无理"，即令清政府君臣上下对英国入侵廓尔喀的真正意图亦毫无所知。他们无视两国战争中的正义何在，惟大清王朝的蝇头微利和"尊严"是从，甚至欲助英国攻打廓尔喀，这简直悖情悖理，荒唐至极！

第二，在嘉庆帝看来，陷清廷于"首鼠两端、进退无据"窘境的理由，不是西藏岌岌可危的被侵略险情，而是尼、英两国政府若都在赛冲阿代表清廷发出的檄谕上做些文章，大清国竟不知发兵助谁才好？而且，清政府并未"因此一言"而劳师远征的原因，仅仅是财政日蹙、"度德量力"而已，以嘉庆帝为首的清政府，仍旧戴着一副"天朝至上"的高度近视眼镜，既无法看清、更无从理解当时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这正是造成近代中国巨大历史悲剧的原因之一。

第三、英善和喜明等驻藏大臣身居边疆，且距廓尔喀一山之隔，应该对尼、英战事看得更清楚。但他们为清廷提供的大量情报错误百出，许多情报皆来自"风闻"，因此酿成清政府决策的一再失误。如果追究责任，除清廷"不必多差弁役，纷纷探听信息"的旨令外，更主要的是驻藏大臣的玩忽职守、只图一己私利所致。

嘉庆二十一正月，廓尔喀王感到亡国在即，向清政府发出最后的紧急呼吁："现在与天朝进贡，若投诚披楞，就不能容我与天朝进贡"。⑳廓尔喀王希图动之以利，以"进贡"为理由敦请清朝发兵。而政治上极度昏聩的嘉庆皇帝却说"其词实属狡诈"，㉑并且责备喜明等人给廓尔喀王的复函"措词犹未得当，应指出其纰缪之处，责以大义，以该国久经投诚，即为天朝臣仆。如届期不行进贡，即属背叛"。㉒试问，对英帝国欺凌弱小、弱肉强食、欲攻占廓尔喀为跳板然后进据我国西藏的强盗行径，清政府置若罔闻，一味作壁上观，"大义"安存？廓尔喀亡国在即，清政府却斥责其"届期不行进贡，即属背叛"，还要"兴师讨

罪”。那么，廓尔喀之罪在清廷看来仅仅是不能如期进贡，不尽“臣仆”之职。既然清政府为“不行进贡”的弱小国家能够兴师问罪，为何对真正的罪魁祸首英帝国的侵略战争，就不能兴正义之师、解彼弱小于倒悬、除边患于初萌呢？

同年，尼泊尔战败，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至鸦片战争前，英帝国势力又逐渐渗入锡金、不丹，西藏的大门已响起侵略者频频的叩关声。

嘉、道二朝政府在治藏问题中的种种失误，致使鸦片战争前四十余年间西藏社会内部矛盾的日趋激化。以后，西藏地方政府和广大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起抗击外来侵略者，而清政府和驻藏大臣却多在几次抗英战争中扮演和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其中虽有个别官员同情并支持西藏人民的正义战争，但很快遭到清廷的贬斥。近代西藏和整个中国一样，社会发展极为缓慢甚至呈停滞状态，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嘉、道二帝为首的清政府的消极保守治藏思想、与驻藏大臣的腐败无能，都是有重要关联的。

---

①、②《清高宗实录》，卷1494，嘉庆元年正月戊辰条。
③《清仁宗实录》，卷38。嘉庆四年正月庚辰条。
④《清代七百名人传》政治、政事，234页松筠条。
⑤《清史稿》卷345，列传132，11172页、英善条。
⑥《清仁宗实录》，卷159，嘉庆十一年四月乙巳条。
⑦同⑥
⑧《清仁宗实录》、卷250，嘉庆十六年十一月甲辰条。
⑨《清宣宗实录》，卷408，道光二十四八月丙辰条。
⑩《清高宗实录》，卷1424，乾隆五十八年三月辛丑条。
⑪《清仁宗实录》，卷104，嘉庆七年十月壬戌条。
⑫同⑪
⑬《清仁宗实录》，卷119，嘉庆八年八月戊寅条。
⑭同⑬
⑮《清仁宗实录》，卷296，嘉庆十九年九月乙未条。
⑯、⑰同⑮
⑱《清仁宗实录》，卷318，嘉庆二十一年五月戊戌条。
⑲同⑱。
⑳《清仁宗实录》，卷315，嘉庆二十一年正月癸卯条。
㉑㉒同⑳。